

■新作聚焦

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 除了“云知道”，还应有更多的人知道

□潘凯雄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这句话在毕淑敏长篇小说近作《昆仑约定》中出现了两次——是作品开篇“自序”的首句，也是作品结束时的末句。由这首尾呼应的设置，不难想象毕淑敏在自己年逾七旬且健康状况并不完全适合这种高强度创作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完成这部长达6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时的那种急迫和冲动。不仅如此，在毕淑敏心中，“这里的故事”绝不应该“只有云知道”，而是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仅是让人知道，更应当被铭记。

这并不奇怪。16岁半的毕淑敏先后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会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过11年兵。十余年服役生涯于她个人而言，是一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正因如此，早在1987年，毕淑敏发表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就是以昆仑为题材的《昆仑殇》。时隔几十年后，她依然执着地将自己年轻时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那种挥之不去的“昆仑情结”转化成文字，编织成故事。虽英勇，却也悲壮，但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对此是否还有兴趣？是否还能产生共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段历史距离当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就多数读者而言，终究已是既陌生又遥远的了。天下还有何君识昆仑？这其实是创作者和出版者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所幸的是，《昆仑约定》面世一年来，在当下文学图书市场反应已属上乘，这十分不易。天下依旧有人识昆仑、忆昆仑、念昆仑！

换个角度解读《昆仑约定》的“成功”也很有意思。这里说的“成功”，包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关键指标，缺一不可。依近些年创作界和出版界流行的话语来划分，《昆仑约定》当可归入“主题创作”或“主题出版”一类。不过我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仅限于对作品题材的一种描述、一种认定，不含任何价值判断。毕竟，简单地以作品题材和主题来划分与评价作品优劣，是片面和无效的。

从作品主题角度看，以下若干关键词在《昆仑约定》中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高原高寒、严酷环境、戍边卫国、青春理想、英雄主义、个体价值与家国情怀……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便是作家究竟如何呈现和表现这些？如何让这些主题得到富有文学性的呈现与深化？于是，我们在《昆仑约定》中看到了毕淑敏对以郭换金为代表的8位16至18岁的女卫生兵，以及其他戍边战士在极端艰苦环境下的工作与生活的书写；看到了诸如楚直、景自连、麦青青等不同角色的军人群像。他们共同在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严酷环境下服役，时刻要面对高寒、缺氧等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威胁，不时还要面临一次次严峻考验与生死抉择。更有一种难以预料的无常：总会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需要直面“生存还是死亡”这一人生终极拷问。有时只是远远旁观，有时却要近距离亲历。置身于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生存境遇中，所谓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不再是墙上的口号或标语，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与作为，是日复一日、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只不过这里的日常，对于在平原地区生活的人来说，就是极端的平常。

这样的主题固然是笔者通读全书后的一种提炼与概括，或许不尽周全与恰切，但在《昆仑约定》的叙述中，至少清晰地、强烈地呈现和传递出了如下信息：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特定时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几年，那是一段狂风暴雨刚刚过去、各行各业日趋稳定、整个社会正努力恢复正常的过渡时期。作品中那些军人——无论是首长还是基层官兵，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其他专业人员，其言与行，都只有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才会显得合情合理。

那是一群个性鲜明的血肉之躯。在戍边军人这个共同身份下，同为女卫生兵，不仅有郭换金成熟背后的隐匿，也有麦青青的“深谙官场伎俩”和叶雨露的“惜爱毁身”，她们的存在都有其合理依据。郭换金的人生道路上，有两位意义重大的引路人——楚直与景自连。二人一文一武，性情截然不同；表面上，他们分别负责医务、军事两类教学工作，看似分工分明，却



共同夯实了郭换金的业务能力与思想根基。除去这些“戏份”较多较重的角色外，还有潘容、龙部长、门可门这些次要角色，正是他们的共同存在，才使得《昆仑约定》更丰满更立体。

那里有死亡的轰鸣和军人特有的情感。在毕淑敏笔下，不仅有墓碑如“齐崭崭断裂的半截刺刀刺向苍穹”，牺牲者“集体静默等待重新集合的号声”这样的意象；更有郭换金目睹心爱的景自连死亡时“泪珠黏附睫毛倔强不落”那种军人特有的隐忍与悲恸。“死亡”虽不是作品中的“常客”，但至少不是“稀客”。如此环境下，“我们的存在，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就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种令人心疼的真实和发自内心的敬重。

那里留存着昆仑在中华文化里独有的印记。作品以“昆仑”为背景为题眼，自然和毕淑敏亲身经历相关。自1969年从军人入伍后的11年中，她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先后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和军医等职。假设这部作品用“喜马拉雅”或“冈底斯”这样的字眼来替换“昆仑”二字，应该也不会乏味，但在文化意象与象征意义的多元与厚实方面，“昆仑”终究更胜一筹。它是“众神之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与文明基因，“人生海拔”这类美誉，终究更多归于昆仑。

正是上述特殊而鲜明的时代印记，正是一群有个性、有故事、命运跌宕的人物的汇聚与碰撞，正是有中华文化特殊印记的昆仑见证，让《昆仑约定》的成功不仅限于主题的鲜明与庄重，更在于其自然得体地从《昆仑约定》的整体叙事中生长而来。只有思想性、独创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主题创作，才称得上是有意义、有价值和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文学创作。

说实话，在读到《昆仑约定》的初稿之时，我自己的态度也是犹疑的。当然，我不怀疑这部作品的品质，也不是怀疑作家的能力，只是担心当下的读者是否还会认同作品中传递的

价值，是否还能欣赏作品的艺术追求？毕竟，近年来，严肃文学的市场境遇并不尽如人意，其中确有一些原因，但更多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独自所能解决的。

这样的现实，确实给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的良性发展抛出了若干亟待正视、深入思考、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首先，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读者青睐，根本在于处理好“写什么”与“怎么写”。文学创作的极大丰富性固然决定着它们受众的差异，既不能简单地“以销量论英雄”，也不应是圈子化的“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昆仑约定》中呈现的“人与山的契约”“生与死的盟誓”和“青春与信仰的共振”这些内容，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显得空泛而乏味。《昆仑约定》融作家之生活积累、生命体验、浓郁情感和艺术呈现于一体，很好地处理了宏大与崇高的主题。这一切，过去只有“云知道”，而云散去之后，唯有优秀的文学能让它永驻人间。

另外，图书出版市场也需要有效的管理，图书产业发展也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但竞争并非无序，规则制定尤为重要。所谓“AI时代”也并非简单的“流量为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流量背后的力量，坚定地守住“内容为王”的准则。

上述几句看似与《昆仑约定》无关的话，实则不然。不仅是《昆仑约定》，假定我们对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理性的认识而非理念的“归堆”，假定我们对市场的管理能更为精准而有效，那么，《昆仑约定》这类优秀文学作品触达读者的传播渠道将更为宽广，传播力也会大幅增强。

这里的故事，不能只有“云知道”。云散之后，人间总该留下点什么。

（作者系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评论家）

■创作谈

我终于完成了对一座山的承诺。不辜负这座山，是我对自己许下的心愿。那时，我们十几岁，尚未来得及盛开为花，就被生活直接拍砸成凝冻的松柏。在海拔近5000米的边防线上，我和战友们曾全力以赴保家卫国，将残酷过成家常。我们的存在，让背后的山河和人民，安享和平。每日望向苍莽山河，我许下心愿……

近40年前，我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名叫《昆仑殇》。为曾经的岁月书写，是我的初衷和坚持的动力。

只是这一次，刚写完最后一句，还未来得及松口气，便觉周身极度不适，只得星夜赶往医院就诊。医生很严肃地告知，须马上住院。从医多年，我知道大动脉内的游走性血栓十分险恶。扪心自问，我是真的不惊恐，真的不惧怕吗？此时，大脑中只回荡着一个声音——直面死亡之前，我将《昆仑约定》初稿的最后一个字，完成了。

其后两年多时间，我一边治疗，一边反复修改这部小说。每次改完，都会不争气地又进医院。共三次急诊，四次住院。有次，医生径直报我“病重”。

潜伏了半个多世纪的心愿，一朝实现，险些耗尽我全部的生命能量。

回忆是孤独的。我在城市的中心处，按下静音键，让自己化成隐草，只存书写昆仑往事的决心。我肝胆欲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在蛛丝马迹中踟躅前行。一闪一闪远去的气若游丝的故人，如干燥破碎的脱水菜，浸没在冰冷砭骨的雪水中，慢慢膨胀、鲜活。

之前有人问过我：你在什么地方写作最惬意？我总是说，任何地方。但这一次，我找到了最佳去处。在急管繁弦的城市，住进了养老公寓。朋友来看我，说这里寂静。她没用“安静”，而是悄无声息地升级至更无声的词。寂静，大多用来形容洪荒。

我说，这个环境，比较接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朋友道，这么说，你是特地选了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也多点儿真善？

我说，做精神田野的锄禾日当午者，是写作人的责任。

我年轻时，身体里居住着沧桑的灵魂。当我70岁时，借这部小说的书写，重新潜入16岁半的心灵，寻觅温暖与光明。我的工具是我的体验、我的记忆、我的大脑、我的手指、我的肝脾肺肾……总之，全身总动员。熬煮文字的过程，我把记忆汇总成述说。那些字句，氤氲凛冽雪气，激励我向前。

这份高度投入情感和体力的工作，让我衰弱疲惫。但我欣然。此刻，它终于脱离了我的心和手，信马由缰地走啊走，直到遇见了读者您。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人间。为这部小说，我已尽力，只求不完美中的较好。读者朋友们，在小说中，我静静等您。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芙蓉》《作品》《百花洲》《红岩》《延河》《清明》：

Z世代写作与新大众文艺的青年面向

□林润楷 郭超

“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青年，是伴随着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时代而生的“数字原住民”。近年来，文学期刊多设有专门栏目以鼓励青年作者，如《芙蓉》的“00后小说辑”、《作品》的“网生代”、《百花洲》的“新锐·出发”，《红岩》《延河》《清明》也陆续发表了Z世代作者或泛Z世代作者的相关作品，标志着Z世代正以较为集中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这些作品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的生活经验，更是网络时代、学校环境以及期刊机制交织之下Z世代写作的真实样本。

可以看到，Z世代写作以积极的姿态汇入了新大众文艺的现实版图。首先，这些作品使文学的主题覆盖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并从日常的细部折射出独特的时代经验。如任源的小说《多肉植物手记》（《作品》2026年第3期），讲述大学宿舍的夏日生活，娓娓道来的琐碎日常中贯穿着留学、实习、求职与考试的焦灼，同时也蕴含了同辈竞争的压力与疲惫。小说的叙述中穿插着“我”的多肉植物观察记录。这棵多肉植物既是“我”的陪伴物，也是“我”的精神外化。其从枯萎、复生到迁移的过程，也象征着“我”的自我照护。这种琐碎的经验，清晰传递出Z世代的自我实现压力。顾湘的《月亮上有座桥》（《百花洲》2026年第2期）通过母亲照护孤独症孩子的经历，呈现了女性身体、家庭责任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多种困境。郭伊格的《杀破狼》（《芙蓉》2026年第3期）表现了AI时代的青年人在资本逻辑、个人前途与真情之间的艰难抉择。这些作品从微观维度出发，捕捉并呈现Z世代独特的生命体验，更关注普通人在具体生活中与所处的时代发生关联。

Z世代写作大量调用“类型文学”的多样资源，如杜峤的

Z世代写作体现了年轻作者如何从现代媒介形式中探索表达方式。这不是文学向大众的单向传播，而是大众生活、媒介环境与青年写作共同作用之下的全新场域。作品从日常生活的细部出发，将普通年轻人的生命体验、内心情绪以及表达焦虑带入文学之中

《沧海一声笑》（《芙蓉》2026年第3期）以同粤语歌为标题，融合武侠、港片以及以配音工业为代表的粤语流行文化，呈现青年一代如何通过声音与影像回到过去、勾勒自我，并通过“江湖”建构身份认同。小说中的“声音”不仅是一种情节线索，也是一种媒介记忆，承载着人物通过影视、歌曲与模仿“拼接”出的过往的文化经验。因此，这不是简单写一代人的怀旧，而是“媒介化怀旧”，这类作品所叙述的不是亲历的历史，而是经由声音、影像以及网络传播“再生产”出来的记忆。陈菱莹的《山羊岁月》（《芙蓉》2026年第3期）借用了动物寓言、“后人类科幻”以及反乌托邦叙事的资源，将对劳动制度与职场规训的讽刺移植到羊类社会之中。乙札的《万安寺》（《作品》2026年第4期）不是典型的悬疑或奇幻小说，而是运用寓言、传说以及传统类型叙事的“救贖”结构，将古典题材组织为一个介于记忆、信仰与传说之间的叙事场域。这也意味着“网生代”的年轻作者正在借助类型化的文化资源，将武侠、悬疑、科幻、游戏作为表达生活的工具，营造出一种中间性的表达方式。

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被表达？Z世代的青年写作正在尝试回答这些关乎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崔故

的《寻找最佳主角》（《百花洲》2026年第1期）从一场小说“抄袭”的指认事件展开。吴风指认“我”的小说抄袭了他的旧作，“我”则为了自证清白而查找旧书，追问梦境，尝试发现文本的真正来源。随着调查的持续推进，“我”逐渐发现吴风的小说也与他人梦境、记忆以及现实经历互相缠绕。于是，作品的焦点便从抄袭纠纷转向“元小说”维度的追问——经验被转述、改写并作为文学发表的过程中，谁有资格进行讲述，谁又该为讲述承担责任？与之相近，张喆的《空白》（《作品》2026年第3期）与张梦麟的《小说家的马》（《作品》2026年第1期）也是带有“元小说”意味的尝试。《空白》通过“空白书写大赛”的荒诞设定考察写作的意义，呈现出Z世代对文学评价规则、意义制造机制的追问——生活于“表达过剩”的时代环境中，“无内容”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表达？《小说家的马》则追问作者、人物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亦即不仅叙述者控制故事，故事也同时控制着叙述者。这种实验性尝试虽然大胆地测试了叙事的边界，但也容易因叙事结构的精巧而削弱现实经验的厚度。

此外，Z世代写作还呈现出一些其他特征。首先是女性经验的突出体现。除之前提及的《月亮上有座桥》，其他如《书之事》（《百花洲》2026年第2期）关注女性知识传统，《无名叙事

信三封》（《作品》2026年第1期）则探讨传统性别伦理。这类写作经验的多样性与深刻性也说明Z世代女性写作并不只是个人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女性与历史、知识、伦理之间关系的再审视与再解读。其次，地方经验也是Z世代写作的内容之一。如《南门路》（《作品》2026年第5期）写地方街道、饮食、民俗与生活记忆，勾勒出丰富而具体的生活纹理；《不适之地》（《作品》2026年第2期）则写返乡青年体验到的隔膜、失根与代际失语——城市没有完全接纳年轻人，乡村也难以再度安放他们的身心。这样的返乡经验，与大量青年流动于城市、县城、乡村之间的现实紧密相连。

综合观察，近期许多刊物中的Z世代写作体现了年轻作者如何从现代媒介形式中探索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些作品勾勒的，正是新大众文艺青年面向的发展图景。这不是文学向大众的单向传播，而是大众生活、媒介环境与青年写作共同作用之下的全新场域。这一形式不限于表现宏大主题，也不完全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路径，而是从日常生活的细部出发，将普通年轻人的生命体验、内心情绪以及表达焦虑带入文学之中。不过，部分作品仍然存在结构先行、设定先行、概念先行的问题，部分作品过于关注形式的先锋性，但对现实的开掘还停留于表层，人物的丰富度、复杂度不足，这都需要写作者不断积累生活经验才能有所突破。正如连志照的《我是从羊圈里走出来的作家》（《延河》2026年第3期）所说：“文学离我们很远，人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

（林润楷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郭超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